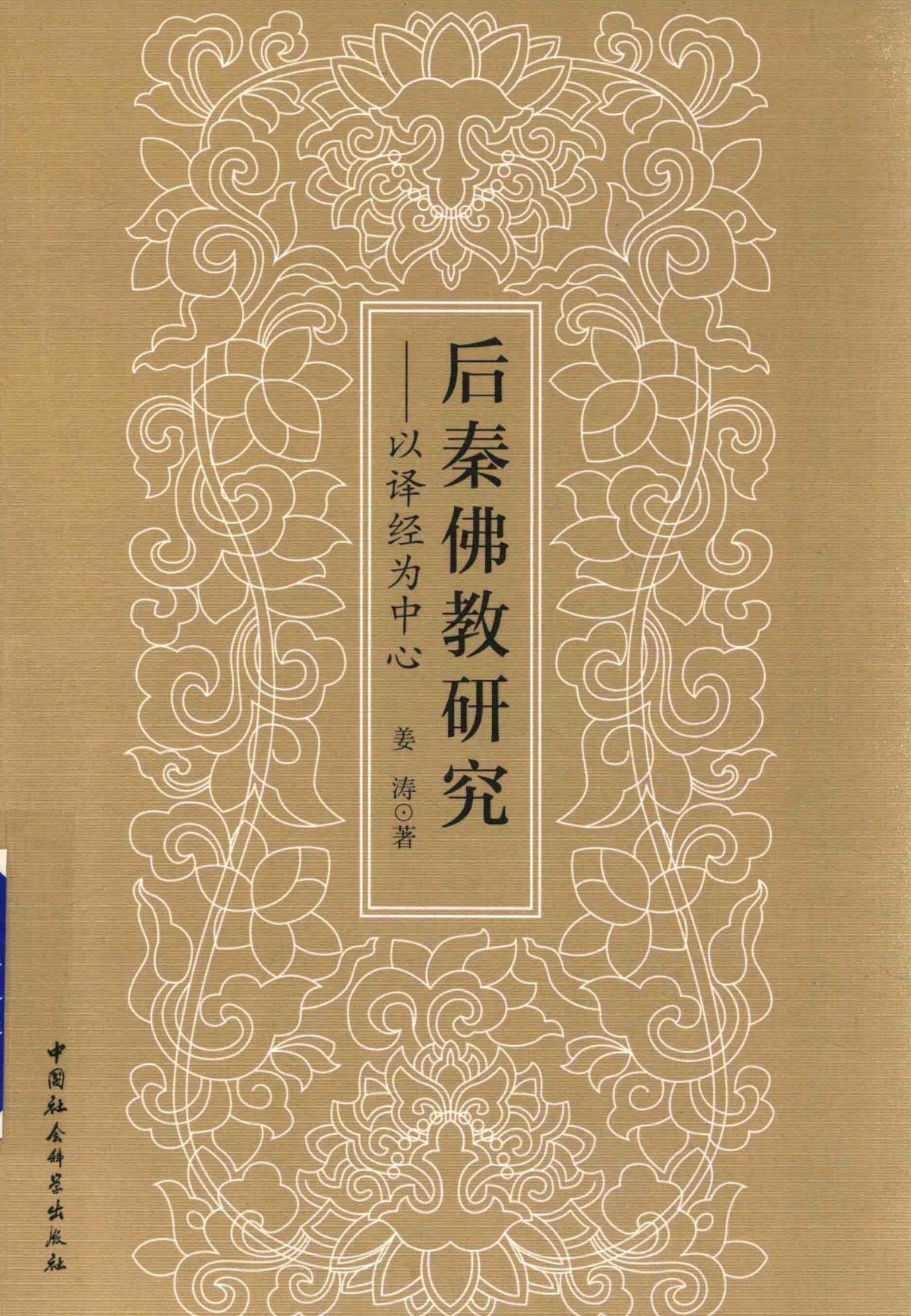




后秦佛教研究

——以译经为中心

姜涛◎著

五、宋 趙鼎

100

后秦佛教研究

——以译经为中心——
姜涛◎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秦佛教研究:以译经为中心/姜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203-0075-9

I. ①后… II. ①姜… III. ①佛教—研究—中国—后秦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508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黄燕生 孙 萍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杜斗城

后秦，亦称姚秦，是“十六国”时期羌人豪强姚苌继前秦苻氏政权之后在长安建立的割据政权，其统治中心为关中及陇山左右地区，历经姚苌、姚兴、姚泓三主。东晋义熙十三年，刘裕入关，后秦灭亡，立国凡三十余年。后秦国祚虽短，但其佛教兴盛，在“十六国”中显得非常突出，史言其境“慕道舍俗者，十室其半”，“事佛者十室而九矣”。然学界对于后秦佛教之关注多集中于鸠摩罗什及其所译佛典，事实上，后秦佛教除译经外，在僧团制度、译场制度、僧官制度、石窟艺术等方面皆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和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姜涛的这部著作以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基础——译经为重点，对后秦佛教进行了梳理、还原，不仅对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译经僧及其译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和分析，而且结合译经情况，对统治者与佛教的关系、长安僧团、译场制度、僧官制度、石窟艺术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并且有新的观点出现。

首先，不论在中国佛教通史还是断代史中，都尚未出现以“后秦佛教”作为选题的专题性研究。此书是首部对后秦佛教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专题性研究著作，填补了断代佛教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其次，此书对鸠摩罗什、竺佛念、弗若多罗、佛陀耶舍、昙摩耶舍这五位后秦译经高僧及其所译四十四部佛典进行了评述。论述过程中，均先考订译经僧在后秦时的译经数目，复详其生平行履，再对其所译经典逐一解读与评析。对每部经典的解读与评析，也都是从译本现状、同本异译、翻译背景、组织结构、主要内容、思想内涵、注疏、影响等方面进行的。

最后，此书在后秦佛教的有关问题上有新的成果。例如，对史籍所见后秦长安僧团的实际人数、译场的具体情况、设立僧官的确切时间等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

当然，这部书作为后秦佛教研究的专门性著作，亦有许多不成熟和有待补充的地方，如对后秦译经的义理剖析和思辨解读略显单薄，对后秦佛教对石窟艺术的影响还有继续研究的空间等。

姜涛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后保送至我名下硕博连读。其研究生期间，就对佛教考古和佛教文化抱有极大兴趣，记得我为研究生开设的《佛教文献概论》《敦煌佛教艺术》等课程的课堂上他总是认真学习，勤于思考，积极提问，虚心求教。而且，还多次利用寒暑假，随我前往甘肃各地进行佛教石刻造像和中小石窟寺的田野调查，在实践中学习和获取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加之其本人悟性强，思想活跃，又能学以致用，故在佛教史及石窟寺考古方面进步尤快。在攻博期间，随着能力的提高，更成为我的重要助手。拙作《正史佛教资料类编》《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河西佛教史》等科研成果的问世，姜涛都出力不少。读研期间其还在《中国宗教》《敦煌学辑刊》《图书与情报》等核心刊物发表相关论文数篇，展现了一定的科研能力。毕业后，其留校任教，在教学和科研上都取得了不少成绩。现摆在我面前的书稿《后秦佛教研究——以译经为中心》，是我为他选定的博士论文，已顺利通过答辩，后经补充修改，拿出来供学界评判，并希望得到方家的宝贵意见，进一步完善。在此书付梓之际，我作为导师，很高兴为此书的问世写几句话，以表达我看到学生进步的兴奋之情！

2016年10月于兰州大学杜撰斋

摘 要

“十六国”时期的后秦政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仅存在了三十余年，但后秦佛教却因其译经的深远影响而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后秦译经不仅体现和促进了当时佛教的兴盛，而且对后世中国佛教哲学及南北朝隋唐时期成实、三论、律宗、天台等宗派的形成，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故本书以译经为中心，从后秦佛教兴盛的背景入手，在重点探讨译经僧及其译经的同时，对统治者与佛教的关系、后秦长安僧团、译场制度、僧官制度、佛教对石窟艺术的影响等问题加以论述，希望由此还原后秦佛教的本来面貌。

本书共分三章。

第一章主要从前代佛教的影响、姚兴等统治者的崇佛、后秦长安僧团的形成三个方面，对后秦佛教兴盛的背景加以阐释。其间，论及以鸠摩罗什为核心的后秦长安僧团时，还从相关史籍中梳理出了三十八位僧团成员。这些高僧不仅对后秦佛教的兴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后秦亡国后，他们对南北朝佛教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二章是全书的主体，不仅包含对鸠摩罗什、竺佛念、弗若多罗、佛陀耶舍、昙摩耶舍这五位后秦译经高僧生平履的考察，而且对他们在后秦所译《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论》《中阴经》《菩萨处胎经》《十诵律》《四分律》《长阿含经》及《舍利弗阿毗昙论》等四十四部佛典，进行了解读与评析。在本章的论述过程中，对每位译经僧及其译经的研究，都是先考订该僧在后秦时期的译经数目，复详其生平履，然后再对其所译经典逐一解读与评析。对每部经典的解读与评析，也都是从译本现状、同本异译、翻译背景、组织结构、主要内容、思想内涵、注疏、影响等方面进行的。

第三章主要讨论后秦佛教的历史贡献及其与麦积山、炳灵寺石窟的关系。后秦佛教的历史贡献既可以从后秦译经事业的意义，又可以从僧官制度的创立及其影响得以体现。其中，后秦译经事业的意义主要体现为译场制度的确立及译经对中国佛教的影响。这部分既可视作为对前文所述后秦译经的小结，又可作为后秦佛教历史贡献的重要组成。后秦佛教不仅导致了麦积山石窟的开凿，而且对麦积山、炳灵寺石窟“十六国”时期的造像、壁画题材也颇具影响。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后秦佛教兴盛的背景	(15)
第一节 后秦之前的佛教发展状况	(15)
第二节 后秦统治者的崇佛	(18)
第三节 后秦长安僧团的形成	(24)
第二章 后秦的译经僧及其译经	(32)
第一节 鸠摩罗什及其译经	(33)
第二节 竺佛念及其译经	(155)
第三节 弗若多罗及其译经	(170)
第四节 佛陀耶舍及其译经	(177)
第五节 昙摩耶舍及其译经	(192)
第三章 后秦佛教的贡献及有关问题	(199)
第一节 后秦译经事业的意义	(199)
第二节 僧官制度的创立	(206)
第三节 后秦佛教与麦积山等石窟	(210)
附 录	(219)
附录一 后秦出经表	(219)

附录二 后秦佛教史编年	(225)
参考文献	(230)
后 记	(244)

绪 言

一 研究对象及意义

所谓“后秦佛教”，是笔者受前辈学者杜斗城先生《北凉佛教研究》^①的启发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因为到目前为止，国内外治中国佛教史之学者，论及“十六国”后秦时期的佛教状况，要么将其置于“十六国”“东晋十六国”乃至“魏晋南北朝”之下加以探讨，要么仅以鸠摩罗什作为后秦时期佛教的代表展开论述，尚未有研究者专门从“后秦”的角度，对当时的佛教状况进行系统剖析。

后秦，亦称姚秦，是“十六国”时期羌人豪强姚萇以长安为中心建立的割据政权。从公元384年姚萇于渭北拥兵自立，改元白雀，自称秦王起，至公元417年姚泓归降东晋，共历三主，立国32年。^②这期间，姚萇时，后秦初创，根基未稳，战乱频繁。姚兴称帝后，励精图治，后秦遂发展成为“十六国”时期北方地区的强国，版图包括今陕西省的大部和甘肃、宁夏、山西诸省的一部分。末帝姚泓执政不久，后秦即为东晋所灭。虽然姚秦历经三代国主，且尽皆崇奉佛法，但囿于上述史实及现存史料，本书的研究只能更多地集中于姚兴统治时期（公元394—416年）的后秦长安佛教。也就是说，本书在时间上，将以后秦时期的姚兴时代为

① 杜斗城：《北凉佛教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

② （清）万斯同撰：《晋僭伪诸国世表》亦以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后秦白雀元年，384年）作为后秦的起始，以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后秦永和二年，417年）作为姚秦的终结。然若以此计，后秦应立国三十四年，但《晋僭伪诸国世表》却言其立国“凡三十二年”。[上述参见（清）万斯同撰《晋僭伪诸国世表》，载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三）》，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966页]之所以如此，笔者以为主要是因为姚萇虽于公元384年僭越称王，改元白雀，却并未称帝。直至公元386年，其率军攻入长安，方才称帝定都。改元是政权更替的重要标志，故可视为姚秦之始，但后秦真正立国的时间还应以称帝建都之时为准。

主；在空间上，则以国都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作为研究重点。

本书之所以“以译经为中心”，主要是因为从现有资料来看，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译经僧及其译经在后秦佛教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首先，被我国佛教界誉为“四大译师”之首的鸠摩罗什，在驻锡长安的十余年间，以译业为重，共译出佛教三藏三十五部合二百九十四卷^①，对中国佛教的影响至为深远。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前文所说的多数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者直接将对鸠摩罗什及其译经弘法活动的研究等同于后秦佛教研究的局面。其次，后秦国祚虽短，但在姚兴等统治者的扶持下，通过鸠摩罗什等译经僧的努力，所译佛经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在“十六国”时期独占鳌头。这些译经不仅体现和推动了后秦佛教的兴盛，而且为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佛教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最后，在后秦佛教的研究中，无论是统治者与佛教的关系，还是佛教对石窟艺术的影响，抑或长安僧团的形成、译场制度的确立等，皆与后秦译业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它们都是围绕着后秦译经事业展开的。

总体而言，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以译经为中心的后秦佛教。具体来讲，重点在于对后秦译经僧及其译经的全面剖析。此外，还包括对前代佛教发展状况的回顾、对后秦统治者与佛教关系的探讨、对后秦长安僧团的考察、对译经事业历史贡献的讨论、对后秦僧官制度的研究以及对后秦佛教与麦积山、炳灵寺石窟关系的论述等。

虽然后秦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仅存三十余年，如昙花一现般短暂。但其“佛教兴盛”^②，特别是姚兴统治期间，社会相对安定，加之鸠摩罗什等高僧的东来，不仅译经事业盛极一时，而且境内“慕道舍俗者，十室其半”^③，“事佛者十室而九矣”^④。事实上，后秦佛教除译经之外，在僧团制度、译场制度、僧官制度等方面皆对中国佛教的发展颇有影响。然而，这堪称隆盛且颇具价值的后秦佛教却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至今尚无对其进行详尽研究的专著。前辈学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后秦译经上。当然，译经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基础。而且，后秦译经在中国佛教史

① 此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所载。另《开元释教录》卷四载为“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

②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

③ （梁）释慧皎撰：《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40页。

④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85页。

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后秦佛教研究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应当予以关注。但遗憾的是,他们对后秦译经的关注仅仅局限于鸠摩罗什所译的一些重要经典,而对于相对影响较小的罗什译经及其他后秦译经僧所译经典则少有涉及。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对后秦译经僧及其译经进行较为全面的整理和分析,希望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僧官制度等其他后秦佛教状况的探讨,尽可能地还原后秦佛教的本来面貌,使其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 研究简史

根据前文所确定的后秦佛教研究对象,本书拟从后秦时期佛教概况研究、译经研究和其他相关问题研究三个方面,对前贤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1. 后秦时期佛教概况研究

虽然目前尚未出现以“后秦佛教”为题的专门性研究成果,但各种“佛教史”中皆有能够被划归后秦佛教研究的部分,基于“佛教史”的体裁,这些部分往往具有总说的性质,故笔者将其暂称为后秦时期佛教概况研究。涉及后秦时期佛教概况的中国佛教通史或断代史主要包括:中国学者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①、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②、郭朋的《中国佛教思想史》^③、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④、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⑤、方立天主编的《中国佛教简史》^⑥以及日本学者镰田茂

①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上海书店1989年版。其中,与鸠摩罗什及其译经相关的研究散见于第三至第十一章中。

②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第十章“鸠摩罗什及其门下”较为集中地考察了鸠摩罗什及其译经等后秦佛教相关问题,后秦译经及译经事业的影响散见于第十二、十八、十九、二十章的相关论述中。

③ 郭朋:《中国佛教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上卷第八章“鸠摩罗什及其译经”较为集中地论述了鸠摩罗什及其译经的情况。

④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88年版。其中,关于后秦姚兴的崇佛、鸠摩罗什及其译经、后秦所译主要经典的佛教思想等问题,主要见于第二卷第二章第五节至第九节;关于僧官制度的探讨,主要见于第三卷第一章第五节。

⑤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关于后秦佛教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第四章下“鸠摩罗什及其门下”。

⑥ 方立天主编:《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第三章第三节“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可视为后秦佛教概况。

雄所著《中国佛教通史》^①等。这些佛教史著作基本上是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间为序，以各个时代的佛教为专题，来探讨佛教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但在介绍“十六国”后秦时期的佛教时，基本只是探讨鸠摩罗什及其译经弘法活动，鲜有从整体上对后秦时期的佛教状况进行把握者。尽管其中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对后秦时期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译经僧及其译经、译经思想、译经事业的影响、姚兴对佛教的扶持、僧官制度等问题进行了相对详尽的论述。但是，他们的研究依然只是以鸠摩罗什为出发点谈当时的佛教概况，不仅在形式上未能将散见于各相关章节的经典剖析、译业影响、僧官制度等研究统摄于后秦佛教的研究体系中，而且在内容上也不够深入、具体，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

2. 译经研究

关于后秦译经的研究，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加以回顾：宏观方面，主要包括对后秦译经僧及其译经数量的讨论和对后秦所译佛教经典的总体把握；微观方面，则是指对后秦译经的个案研究。

(1) 宏观方面

在后秦译经僧的研究方面，除了《出三藏记集》《历代三宝记》《开元释教录》等经录中对姚秦译经僧数量和生平的介绍外，今人王铁钧所著《中国佛典翻译史稿》^②中对鸠摩罗什、竺佛念、佛陀耶舍、弗若多罗、昙摩流支等后秦译经僧的生平也进行了介绍。其他关于后秦译经僧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对鸠摩罗什的研究。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章中^③、郭朋在《隋唐佛教》第二章中^④、任继愈在《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二章中^⑤、游侠在《中国佛教》第二辑中^⑥、镰田茂雄在

① [日] 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二卷），关世谦译，高雄：佛光出版社1986年版。其中，牵涉后秦佛教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第三章“鸠摩罗什——其译经事业”。

② 王铁钧：《中国佛典翻译史稿》，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③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208页。

④ 参见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87—199页。

⑤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7—272页。

⑥ 参见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二辑），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37—43页。

《中国佛教通史》第二卷第三章中^①，皆对鸠摩罗什的生平及所学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另外，郑郁卿著《鸠摩罗什研究》^②、尚永琪著《鸠摩罗什》^③以及陈世良撰《鸠摩罗什年表考略》^④等论著亦对鸠摩罗什的履行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当然，对鸠摩罗什的研究远非如此，限于篇幅，暂不一一列举。

后秦译经数量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开元释教录》等经录的记载来进行的。《开元释教录》卷四载姚秦译经“总九十四部合六百二十四卷”^⑤。现代学者童纬在其所编《汉魏两晋南北朝出经籍表》中则提出姚秦“共出经、论、疏释94部632卷”^⑥。此外，吕澂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中对鸠摩罗什译经数量的考证^⑦，王文颜在《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中将鸠摩罗什所译《梵网经》和《仁王护国经》勘定为疑伪经^⑧，以及日本学者小野玄妙在《佛教经典总论》中对后秦所译经目的辨析^⑨，也都对后秦译经数量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对后秦所译佛教经典的总体把握上，前文提到的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郭朋的《中国佛教思想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以及镰田茂雄的《中国佛教通史》等中国佛教断代史或通史中，皆对鸠摩罗什及其译经做了概括性的综述，它们可以被视为从总体上把握后秦译经的基础研究。近年来，刘保金所著《中国佛典通论》^⑩也将后秦

① 参见〔日〕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二卷），关世谦译，高雄：佛光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267页。

② 郑郁卿：《鸠摩罗什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尚永琪：《鸠摩罗什》，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④ 陈世良：《鸠摩罗什年表考略》，载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6页。

⑤ 《大正藏》第五十五卷，第511页下。

⑥ 童纬：《汉魏两晋南北朝出经籍表》，《佛学研究》2004年，第100页。

⑦ 详见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页；吕澂编《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0年版。

⑧ 详见王文颜《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112、129页。

⑨ 详见〔日〕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杨白衣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66、73、77页。

⑩ 刘保金：《中国佛典通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所译的不少重要经典依其内容散列于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各部类佛教典籍中加以介绍。王铁钧所著《中国佛典翻译史稿》第二章中的相关内容则从翻译学的角度,对后秦译经特别是鸠摩罗什的译经,做了较为详尽的评述。^①此外,丁福保编纂的《佛学大辞典》^②、蓝吉富主编的《中国佛教百科全书》^③以及慈怡编著的《佛光大辞典》^④等工具书,也较为集中地收录了后秦译经,并对其进行了简单介绍。日本学者望月信亨所编《望月仏教大辞典》^⑤和小野玄妙编纂的《仏書解説大辞典》^⑥则系更早的佛学研究工具书,亦可为我们了解包括后秦在内的各代译经提供有益的参考。另外,小野玄妙所著《佛教经典总论》不仅将后秦译经总体归入了佛经翻译的旧译时代,而且对后秦诸译经僧及其译经进行了简要的评介和辨析。^⑦

(2) 微观方面

中日学者在后秦译经的个案研究方面,成果丰富,不胜枚举,但囿于各方面条件,全面搜集尚属难事,更不必说遍览分析,加之此处篇幅有限,故笔者仅将已阅之论著部分列出,虽知此为挂一漏万之举,然事出无奈,不足之处,只能留待日后不断加以补充。

郭元兴的《大品般若经》一文从梵汉版本、同本异译、翻译背景、思想内容及注疏影响等方面对其做了介绍。^⑧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在第二卷第七节中也利用中观思想对《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十八空”进行了论释。^⑨郭朋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卷第七章第二节则在分析“十八空”的基础上,对整个般若类经典的性空思想进行了总结。日下俊

① 详见王铁钧《中国佛典翻译史稿》,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162页。

② 丁福保编纂:《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③ 蓝吉富主编:《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全十册),台南: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1994年版。

④ 慈怡编著:《佛光大辞典》(全1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⑤ [日]望月信亨编:《望月仏教大辞典》(全10册),东京:株式会社世界聖典刊行協会1933年版。

⑥ [日]小野玄妙编纂:《仏書解説大辞典》(全15卷),东京:大東出版社1934年版。

⑦ 详见[日]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杨白衣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65—66、71—74页。

⑧ 详见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三辑),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131页。

⑨ 详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347页。

文《小品般若經の方便思想》则对《小品般若经》中提出的方便法门做了简要分析。^① 小峰弥彦《一切智と般若波羅蜜：小品般若經を中心に》对《小品般若经》中提到的“一切智”“般若波羅蜜”的内容及关系进行了探讨。^② 上述即为对鸠摩罗什译大小品《般若经》的研究。

《金刚经》的研究方面，方广鋈《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及其注疏》对国内外现藏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及其注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与介绍。^③ 王孺童的《〈金刚〉“九喻”瑜伽述义》主要从“九喻”出发，对属于中观派的鸠摩罗什译本与属于瑜伽行学派的其他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④ 稻吉陽子的《〈金剛般若經〉における菩薩觀》则对《金刚经》中的菩萨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⑤

《法华经》的研究方面，郭朋著《隋唐佛教》第二章第二节以及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八节皆结合经文对《法华经》的思想内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⑥ 方立天的《〈法华经〉与一念三千说》对《法华经》中反映的一念三千说，从内涵、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评述。^⑦ 严耀中《论隋以前〈法华经〉的流传》则对隋以前《法华经》在中国僧俗社会的流传情况做了深入的考察。^⑧ 日本学者境野黄洋《〈正法華經〉と〈妙法蓮華經〉との比較》对竺法护和鸠摩罗什的《法华经》译本做了比较研究。^⑨ 高橋理空《発菩提心と二乗作仏：〈妙法蓮華經〉を中心にし

① 详见〔日〕日下俊文《小品般若經の方便思想》，《印度学仏教学研究》57（29—1），1980年，第252—254页。

② 详见〔日〕小峰弥彦《一切智と般若波羅蜜：小品般若經を中心に》，《密教学研究》13，1981年，第82—93页。

③ 详见方广鋈《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及其注疏》，《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第73—80页。

④ 详见王孺童《〈金刚〉“九喻”瑜伽述义》，《法音》2009年第10期，第21—26页。

⑤ 详见〔日〕稻吉陽子《〈金剛般若經〉における菩薩觀》，《哲学と教育》（42），1994年，第49—66页。

⑥ 详见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24—137页；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445页。

⑦ 详见方立天《〈法华经〉与一念三千说》，《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2期，第48—52页。

⑧ 详见严耀中《论隋以前〈法华经〉的流传》，《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29—35页。

⑨ 详见〔日〕境野黄洋《〈正法華經〉と〈妙法蓮華經〉との比較》，《駒沢大学仏教学会年報》1，1930年，第74—100页。